



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获奖作品选

文人事

周闻道——主编

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

文人事

周闻道

——
主编

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人事：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/周闻道主编. —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5.9

ISBN 978 - 7 - 218 - 10333 - 4

I. ①文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9423 号

Wenrenshi diliujie zaichangzhuyi sanwenjiang huojiang zuopinxuan

文人事：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

周闻道 主编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曾莹

责任编辑：古海阳

排 版：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

装帧设计：礼孩书衣坊

责任技编：黎碧霞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（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
电 话：(020) 83798714（总编室）

传 真：(020) 837801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：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：23.75 字 数：330 千

版 次：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(020)83795240

在场主义的批判精神引导文学走向（代序）

丁 帆

大时代下，文学创作者一定要坚守“在场”，即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“在场”。这是去年在海口参加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学术交流活动，一些媒体采访我时，我旗帜鲜明地阐明的一个观点。这不仅表明一种创作立场，更表明作家和作品的存在价值，也是在场主义散文奖多年来坚守的重要价值尺度。

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价值尺度有两大内涵：艺术性和在场精神。前者强调的是散文的文学性，是共性的东西；后者则是这个奖独特的东西。在场主义散文奖在评选中，较好地做到两者的融合，这得益于两条原则：

一是奖项性质及评选规则。在场主义散文奖坚持“民间性、独立性、文学性和权威性”的立场，并为此设置了科学严密的评审规则和程序，评委之间坚持“不集中讨论、不沟通商量、不干预影响”的“三不”原则，确保独立评审，最后按照票数来计算，任何一个评委都很难有人为操控的空间。在我国，评奖文化很复杂，评奖生态与机制都有欠缺，这是公认的现实。每届茅奖、鲁奖评选结果公布后，尚且有那么多的灰色传闻和争议，何况其他奖项了。我们虽然无法考证那些传闻的真实性，不可妄加断言，但其结果往往被世人所诟病。到目前为止，在场主义散文奖是所有中国文学奖项中口碑最好、公信力最强的奖项之一，就充分说明了这点。

二是对在场精神的价值坚守。在场精神，就是作家以在场的姿态切进当下，坚持人性，勇于担当。在场主义就是作家在创作时，必须坚守灵魂在场，价值观念在场，以及思想批判性在场。无疑，我们的现实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，也有不少丑恶的东西。作家真实的在场，应当是客

观的呈现，指向真相。但我认为，对美好的东西的最好珍惜，就是不要妄加打扰，让它自然生长。而丑恶则不一样，它是对人类有害的东西，不批判、扼制、铲除，就会造成民族人格的滑坡。因此，在场写作强调把关注的重点，放在国家的、民族的、人民的当下的痛苦之上。这不是“逐恶”，而是重塑国民性的重要之举。因此，周闻道先生去年在接受《文学报》采访时，谈到“在场的使命是批判与唤醒”。我看了后立即给他发了条短信：很好。

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价值尺度，在评选中得到较好坚守。我们评委会已经一再声明过：在场主义散文的核心宗旨，就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，人文价值观念一定要明晰。当之无愧的大奖，是应该站在人类学的高度，来对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，做出有人文情怀的价值判断。否则，那种平面化的写作，即使技术层面再纯熟也会是过眼烟云。

从前六届评选结果看，虽仍有不如人意之处，但总体上这种坚守是好的，而且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朗。比如获奖的林贤治、齐邦媛、高尔泰、金雁、王鼎钧、许知远等作家作品，还有许多获奖单篇作品，都较好地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。

特别是在第五届评选中，将大奖首次授予了一位1976年出生的年轻作家的作品——许知远的《时代的稻草人》。它的获奖，是因为这个时代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太缺乏批判性了。及时性对散文太重要了。我们发现，许知远关注的对象，跟一般人关注的不一样。他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群体，从“五四”到现在，重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反思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这本书在参选的散文中首次出现，马上引起了评委的关注，所以大家都一致看好这本书。授予许知远奖项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期许。

同样，第四届获奖的金雁的《倒转“红轮”》，呈现的也是知识分子问题，为我们提供的则是另一种观照。它关于苏俄文学史料方面的东西，对研究和改变我们以往许多错误的观念，还原历史真相，是很有帮助的。虽然它的散文性可能弱了点，但它的历史价值、更高层次的文学价值，完全可以弥补所短。况且，那种春秋史笔的文字本身，就是充满

着文学性的，人们在其中所得到的阅读快感，远远大于精致的技术性美文，足以让我们进行灵魂的拷问！它对我们无视历史的文学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。

作家当然是知识分子，金雁和许知远的作品获奖说明，作为时代灵魂的知识分子本身，也有一个是否在场、如何在场的问题。

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？这样的诘问和惊叹，是否有些耸人听闻呢？事实就是如此！其实不仅在美国，即便是在中国，其答案都是惊人的一致。

作为一个观察家，拉塞尔·雅各比在其《最后的知识分子》一文前言中的第一句话，就援引了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·斯特恩斯的名言：“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？”这个80年前的诘问，一直回响在全世界知识分子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的节点上。每每在世界进入到一个个重大突发事件时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嘴脸的知识分子的复杂表现。如果说这一跨世纪的诘问，在80年前的中国尚毫无影响的话（因为那时候的中国，其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诞生），那么，在今日的中国愈来愈趋同国际化，当跨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渗透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候，这样的诘问似乎更有其普遍的意义。我们提倡“在场”，而在许许多多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中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“缺席”的。鉴于此，我们不妨阅读一下拉塞尔·雅各比的这本书，或许它能够给我们些许猛醒和启迪。

其实，知识分子在各国的情形都是大同小异的，只不过是其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。对于这些美国式的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内的“缺席”，雅各比显然是持极其愤懑态度的。他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慨叹与抨击是犀利的，究其原因：“政治现实不容忽视，但更深的思潮——社会的和经济的——也影响着知识分子。”“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；它一向趋附于金钱、权力或戏剧性事件，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……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。”针对这样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状况，雅各比提出的核心理念是：知识分子只有进入公众领域，保持社会良知，对于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无情的文化

批判，才能造就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！我以为，其公众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应该是同义词，因为作者在解释“知识分子”一词来源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而不是像有些文章中，故意将这个名词玄虚化。

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很大一部分处于一种“文化休克”状态。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现实状况，他们在拜物教的现实世界里闭上了自己的眼睛。

所有这些对后资本主义的批判，还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，我更加关注的问题的就是对西方“学院派”的反思与批判。雅各比对知识分子十分严厉的态度是发人深省的，从中，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林林总总的面影：“迎合、取媚流行趣味，向商业卑躬屈膝”，“因为心浮气躁，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。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，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，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。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和成果综述；出版发表比怎么写重要得多。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，如何去写作；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。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，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士来加以粉饰。当然，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；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”。但是，就没有知识分子主观上所形成的精神痼疾吗？这也是雅各比应该反思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认可各种权力机制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判断，是它们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给阉割了，它不再是用显性的封建伦理与强权来奴化你，而是用能够使你上瘾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“冰毒”去主动消解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。精神自戕和精神阳痿，似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知识分子通病。更可悲的是，他们心甘情愿地沉湎于那种体面和舒适的状态中，沉湎在精神“冰毒”所制造的幻境之中不能自拔。

应该说，我对当下散文创作的总体状况，并不是很满意的。

一个是闲适泛滥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散文的闲适风气蔓延，消解了散文的锐气和担当。周作人的美文风格虽然好，但是一旦泛滥，那就是散文的一场灾难。我们的民族魂里，如果多一点鲁迅风，便不会回到那种愚昧的精神黑暗中去。一个没有深刻思想家出现的时代，是

一个悲哀的时代；而没有剖析和批判时代精神病灶的散文出现，那是我们散文作家的悲哀！如果读图时代会造就精神侏儒，那么，闲适的文风同样也会培养出一大批慢性自杀的“吸毒者”！

一个是阅读方式影响。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。由于阅读方式的改变，人们很难抽空去阅读长篇作品，除非作品本身的震撼力（也就是“眼前一亮”的作品）感动了你和你阅读圈子里的朋友，大家才去传阅，而引起反响。新也罢，锐也罢，说到底，你的作品的精神标高和正确的人文理想，才是最终决定作品的价值基础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再来评比作品技巧上的优劣。否则，连这个基础都没有，在场主义散文评奖就失去了它根本的意义。

还有散文性和在场精神如何结合，如何把握的问题。

对散文，现在搞学术的人，老喜欢用文体的学术框架去套住它。什么是散文，什么不是散文？只要是能够触动人的灵魂的自由表达，就是散文。什么是好散文——它必须告诉读者我要表达的思想，然后才是我是怎样表达的。

必须强调，文无定法，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融合，也没有统一模式。在这方面，当下散文最不能忽视的有两点：一是思想内涵的深刻与博大，二是苏俄文学的影响。前者需要我们在场，去贴近，去感知，去了解和呈现真相；后者则需要来一个启蒙，吸纳其精华，剔除其糟粕。

新世纪以来许多年轻学者，对百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史不了解，甚至连基本的常识性史料都不了解。在这种境况下，我们的期许就是，从读图时代把他们拉回来去读书，去探寻真实的史料。在对真实史料的发掘当中，建立自己的价值谱系，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，这才是一条正道。

近百年来，中国文学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极深极大，而如今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却是惊人的！苏俄百年历史在中国是没有真相的，起码有三代人都都不了解其真实的状况，包括现在六七十岁的中国学者，因为大量的新的史料我们没有接触到，处在“夜盲”状态之中。近年来，我为什么主张要注重苏俄文学的历史重读？就是因为从“黄金时代”、“白银时代”过渡到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，我们所

接受的知识谱系很多都存在假象。一直到今天，许多背景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还在搞文学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

要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还是俄式、苏式的武器啊！在这方面，《倒转“红轮”》的思想性，完全胜于精致的形式给我们的营养。在场主义评奖可以把精致的美文纳入单篇评审之中，其实我们也执行了这个方针。那宏大的历史为什么进入我们的视野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展现我们和其他奖项之间的区分度。区分度不明确，我们的奖跟官方奖，跟哪个省的散文奖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又有何意义呢？

我们的评奖成果之所以被广泛地认可，主要是我们的立场和独立的价值判断。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引导整个文学、整个文学史走向的灵魂。所以说，我们的评选，代表了我们一批人对这种价值观念的认可。我们坚守的东西，尽管在今天可能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，但我想，若干年后，到了文学进入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，我们的价值坚守将被历史证明。如果当下的我们连历史真相都不了解，就对文学性进行琢磨，那是很可悲的。

所以，散文的思想性比精致的意义要大。在场主义的立场，是独立的价值判断，是引导文学走向独立和自由的必由之路。

2015年7月16日

目 录

001 __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

002 __一个戴灰帽子的人（节选）/邵燕祥

030 __附：邵燕祥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授奖词

031 __瞻对：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（节选）/阿来

066 __附：阿来《瞻对》授奖词

067 __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（节选）/张新颖

106 __附：张新颖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授奖词

107 __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

108 __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/王彬彬

134 __附：王彬彬《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》授奖词

135 __灯光转暗，你在何方？/舒婷

150 __附：舒婷《灯光转暗，你在何方？》授奖词

- 151 __文渊阁：文人的骨头/祝勇
- 177 __附：祝勇《文渊阁：文人的骨头》授奖词
- 178 __梁庄：归来与离去/梁鸿
- 199 __附：梁鸿《梁庄：归来与离去》授奖词
- 200 __《老生》后记/贾平凹
- 207 __附：贾平凹《〈老生〉后记》授奖词
- 208 __运动队/林那北
- 262 __附：林那北《运动队》授奖词
- 263 __行走高原/裘山山
- 276 __附：裘山山《行走高原》授奖词
- 277 __滇西笔记/孙小宁
- 293 __附：孙小宁《滇西笔记》授奖词
- 294 __这样回到母亲河/彭学明
- 317 __附：彭学明《这样回到母亲河》授奖词
- 318 __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/杨文丰
- 331 __附：杨文丰《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》授奖词
- 332 __南太行民间叙事/杨献平
- 362 __附：杨献平《南太行民间叙事》授奖词
- 363 __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（代跋）

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



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(节选)

邵燕祥

邵燕祥，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评论家。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、记者。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。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、记者，《诗刊》副主编，中国作协第三、四届理事。著有诗集《到远方去》《在远方》《迟开的花》《邵燕祥抒情长诗集》，散文集《教科书外看历史》《大题小做集》《热话冷说集》《邵燕祥文抄》，纪实文学《沉船》《人生败笔》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等。

第一章 1960年

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，我得以侥幸回城

1959年8月24日夜，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，雷雨交加，土墙草顶的平房，倚坐大通铺上，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：

真的，这不算异想天开，
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。
把千言万语交付它
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。

西北有高楼，楼上有人在等待，
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；

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，
我给你寄来一片云——一个大海。

它挟着白热的闪电，迅猛的风雷，
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。
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，
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。

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，
每逢初一、十五准要涨一回。
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，
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。

最后的两句，文秀一看就会懂。我们都读过 19 世纪俄罗斯的小说，一起看过 19 世纪俄罗斯的画。在列宾一幅画里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进家门，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，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，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，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。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？是突然遇赦，还是邮路不通，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？……这幅画的题目，有的译为《不速之客》，也有的译为《意外归来》。从哪里归来？监狱，还是流放地？

我在 10 月的秋风里，从黄骅转沧县，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，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“却看妻子愁何在”的欢快，但还是兴奋地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，好像哑巴学会了说话一样，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，听到一声汽笛，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。

既误车，误了车也高兴，索性不着急，重新上车，到天津中转，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，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，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。

从车到北京起，这个全国的心脏，就以出奇的安静、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。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，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，就是

大街上也不见喧哗，人行道上，公交车上，人们好像相约“肃静”，屏口无声。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回来后的景象。“十年大庆”刚过去不久，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，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。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，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，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。

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，我也没这样失望过。我在陷入“非常”的境地时，渴望回到“正常”的生活，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，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，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，比如说，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。那“人民内部”的生活，即使不是轰轰烈烈，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。但是，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，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，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，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，参加“十大建筑”施工时，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，你追我赶……过去了，全过去了。

在中国，户口是最重要的。打成右派以后，所谓下放，叫劳动锻炼也罢，叫劳动改造也罢，首先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，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，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、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。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，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，并注明“想当然”的“自黄骅电台迁来”，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，如其不然，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“摘帽右派”身份，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。

回到老三〇二宿舍院，离去三年，“城郭依旧”，因是上班时间，空空落落的。没有遇见熟人，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——赵无极的妹妹，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，你说巧不巧。大概她也感到意外，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，她可能正因病休息，我只好烦她带个口信，给班上的文秀，说我已找过房管科，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间宿舍，让文秀中午来一趟。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，一起上仓库，借来一床、一桌和两把椅子，就算安顿下来。

那首诗中的“西北有高楼，楼上有人在等待”，从似乎缥缈空灵的

云里雾里，还原到现实生活中那间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。

人的“日常生活”，住在什么样的房屋里，毕竟是次要的，关键还是跟谁住在一起。

公共生活也一样，不看你在简陋的还是堂皇的办公室，端看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样的同事。

家里一起过日子的人，是自己找的。

办公室里的同事，就听天由命了。

我在1959年重新进入办公室。整整十年前，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办公室，曾经带着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！那一年，柳荫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华北大学，找我们面谈，等于面试，决定调我来北京的广播电台。于是我进入中央台左荧为科长的资料编辑科。今天，柳荫又和蔼地对我说，咱们这回一块儿工作了，你先到文艺部的资料室吧。他现在主管中央台的文艺广播、表演团体和唱片社。后来我多次想，柳荫心里不知怎么想的：十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，成长为二十六岁的“摘帽右派”了？

我也如约找了平生第一个上级左荧，他现在是新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，他说广院人手极缺，我回来正好，不过因为柳荫坚持要我上文艺部，他跟柳荫商量，文艺部资料室是个闲职，学院倒是来了就排进功课表，我半天在台里，半天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汉语教研组上班。学院草创，暂时就在离电台不远的一座灰楼，原是电台宿舍，我住过的——幸耶不幸？几年后“文革”开始，我又被关到这里，灰楼成了所谓的“牛棚”。那是后话。

我跟另外四位新来的中文系毕业生一起，给大一同学任汉语辅导教师。同学们每周听北大林焘教授的课，回来由我们判作业，讲评。我没参加听课，半年多的时间，只在什么场合，远远看过林焘一眼。后来我从吴小如处知道，林焘是北平沦陷后间关数千里去大后方，上了西南联大的。

我没读过文字、训诂之学，也没学过现代的语法。我一向认为对范文多读多背，多加揣摩，文法、语法自在其中。所读不多，却学语法，

越学越累也越糊涂。我上小学时看兄姊的高三国文，最后附录了简明的文法常识，如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的分类，如主语、宾语的句子结构，好像一看就懂了。学英文时，有 Diagram，对句子进行图解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《人民日报》连载吕叔湘、朱德熙合著的《语法修辞讲话》，针对当时报纸上的病句，较系统地讲了有关常识……这一些，就是我当辅导教师的“学养”根底了。

这时印尼排华，有大批侨生回国，广播学院专开了一个侨生班，我兼给这个班的学生辅导，主要是改作文。这我倒是轻车熟路，同学们似乎也还满意。即使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，那时候没到“文革”，学生绝少给教员提意见的。

广播学院新校舍落成，要搬到东郊定福庄去，像我这样的“半日制”工作肯定不行了。于是我选择全天回文艺部，不再兼做辅导教师。左荧也表示理解，我告别了以邹晓青为首的这个教研组。邹晓青是“进城”老干部，20世纪50年代初大区撤销后，从《东北日报》副总编辑任上，调到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任职，1958年被打成“温邹张反党小集团”一员。主管对外部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划为右派，他也受了处分。我离开这个教研组不久，温济泽调进来，又跟邹晓青共事了。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，不过我相信他们能够明智地相处。

那时，到处可以遇见“犯错误”的人。文艺部资料室，陈道宗已先我而来。他在反右派斗争中，没有戴右派帽子，但受了降级降薪的处分，大概是所谓“中右”吧。我1949年来电台时，他也是先已到来，原为北大学生，现在跟随杨兆麟跑时政，笔头快，也有活动能力，适于做外勤，但他一直未入党，最后只好离开时（事）政（治）这一摊，去了文艺部。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出身山东的书香门第，他的兄长早已参加中共，后来一直做对外使节；大概因他的父亲与何思源交谊颇深，他被中共地下党物色来做何的统战工作，他的知识分子气在老一辈旧派人物看来顺眼，到革命队伍便显得鹤立鸡群，落落寡合，我就听过文艺部党支部的人说他“清高”，当然是要从贬义理解的。人们说他很难共事，但我没有这个感觉。我们一起帮助柳荫写总结音乐广播（后来